

从走马观花到驻足凝望——

牟氏庄园的内涵与历史地位

□长水



在烟台工作的三年里，我去过两次牟氏庄园。第一次是深秋十月，栖霞的苹果挂满枝头，路边摊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跟着导游的小旗子在人群中穿梭，急着在闭园前看完所有景点。穿过一进又一进的院落时，我只顾着低头跨门槛，偶尔抬头瞥一眼青砖灰瓦，心里嘀咕“不过就是些老房子”，40分钟便走完了全程。回来后在食堂和同事聊起，对方咬了一口苹果问：“虎皮墙你看了没？知道那烟囱为啥立在外头不？”我愣在原地，才惊觉自己的结论何等草率。于是有了第二次造访——清晨，我揣着两斤刚买的红富士，独自一人，做足了功课，把脚步放慢到每一步都踩得住影子。这一次，牟氏庄园才真正向我敞开了它的大门。

建筑

凝固的匠心与生存智慧

牟氏庄园坐落于栖霞城北古镇都村，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至1935年方成今日格局，前后营建逾两百年。整座庄园占地两万余平方米，分“东忠来”“西忠来”“南忠来”“阜栖”“宝善堂”“师古堂”六院，沿南北中轴线次第铺展，有厅堂楼厢480余间。四合院重重叠叠，条条甬道相间，层次清晰，主次分明。站在南群房的门口向北望去，六道穿堂门一线贯通，直到最北端的北群房，视线毫无遮挡。这种严整的秩序感，让人还没踏进屋子，就先感受到一股沉甸甸的礼制威压。

但真正让我蹲下身来挪不动脚的，是藏在秩序背后的巧思。庄园以“三雕”“六怪”“九绝”著称，最令人称奇的是“三大怪”——烟囱立在山墙外、烧炕火洞在室外、穿堂门一线贯通。那近百座烟囱凌空耸立在山墙之上，状若微型楼阁，通体由当地砂岩雕凿而成，既不怕北方冬季的冻融剥蚀，又解决了排烟难题。我第二次去时特意伸手摸了摸其中一座，只见内壁被烟熏得黝黑发亮，外壁却依然纹理清晰。当地老人告诉我，早年冬天孩子们放学，常围着这些烟囱烤手，既暖和又安全，因为火星绝不会溅到屋顶的茅草上。相比故宫将烟囱藏在屋檐下的做法，牟家的设计更务实——既保全了屋面线条的完整美观，又从源头杜绝了火灾隐患。据说牟家祖籍湖北公安县，这些“怪”设计，正是南方移民适应北方气候的智慧结晶。

烧炕火洞设在室外，则藏着另一层心思。北方民居的火炕通常将灶台设在屋内，做饭的余热暖炕，但烟熏火燎总免不了污浊空气。牟家将添柴口开在每间屋子的外墙根，佃户送来柴薪后直接在院子里就能添火，既不用踏入主人的内室触犯礼教，又让室内始终保持洁净。我蹲在“西忠来”的一处火洞前观察了许久，洞口仅碗口大小，内部却有精巧的弯折，既能保证抽力，又不会倒灌烟气。至于那条贯通六院的穿堂门轴线，除了“一脉相承”的吉祥寓意，更有实际功用：盛夏时节打开所有门扇，穿堂风掠过六个院落，比任何降温手段都管用；逢年过节宗族大典，族长站在最北端，便能俯瞰整个家族的阵列，威仪自生。

那面斑斓的“虎皮墙”更是把匠心做到了极致。墙体由白洋河里捞出的河卵石垒砌而成，石块大小不一、色泽各异，赭红、青灰、米白、深褐交错，远看如猛虎斑纹，近看则能辨出“制钱莲花图”“莲生贵子”等精美图案。那天我在墙根蹲了整整半个小时，得知每块石头都经过至少三次筛选：第一次选形状，第二次选色泽，第三次选纹理走向，确保拼出的图案疏密有致。收工时掌灯照墙，若墙面平整得连一枚铜钱都塞不进去，当天的工钱便归石匠，若有缝隙超过发丝宽度，就要返工。平均每块石头造价为一斗谷子，一面墙竟耗去446斗谷子。这种近乎奢侈的投入与堪比现代项目管理的激励机制，让牟氏庄园的一砖一瓦都成了经得起放大镜头检验的经典。后来修缮时，工匠在墙根一块不起眼的石头背面发现了刻字，是当年一位老石匠偷偷留下的姓名——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手艺留了一个隐秘的脚印。

庄园的排水系统同样令人叹服。六院地下贯通着完整的暗渠网络，雨水从天井的镂空石板漏入，顺着暗渠流向院外的白洋河，入口处设有铁篦子拦截杂物。当地文保人员做过实验，即便遭遇暴雨，院内积水10分钟即可排净，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水浸。这种在建造之初便统筹考虑的系统工程思维，即便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



牟氏庄园一隅。

2026年9月18日 星期五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烟囱立在山墙外。

文化

逆流的抉择与耕读底色

若说建筑是牟氏庄园的骨架，那么“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八个大字便是它的灵魂。这方匾额悬于“西忠来”大门之上，字迹端正朴拙，没有半分炫耀之气，却昭示着牟氏族人数百年来最坚定的精神选择。

牟家并非寻常暴发户。始祖牟敬祖于明洪武年间以岁贡身份出任栖霞县主簿，卸任后因爱栖霞山水秀丽、民风醇厚，遂落籍于此。此后数百年间，牟氏家族共出进士10人、举人29人，京官3人，州官3人、县官61人，原本走的是一条标准的科举进阶之路。转折发生在第十世牟国琬身上。他在直隶南官县任知县时，因清廉刚正得罪了当地豪绅，被诬陷贪赃枉法，虽经核查后冤情得雪，但仍被罢官归乡。返乡时行李萧然，只有几箱书籍和一身旧袍。他没有像一般失意文人那样寄情山水、吟诗作赋，而是在县城郊外购置了数十亩荒地，搭起草棚，白天亲自扶犁耕作，夜晚在油灯下读书课子。他在草棚柱子上自题一联：“半日读书半日稼，亦可为儒亦可为农。”在“学而优则仕”的洪流中，牟国琬主动选择了逆流而上——不是被迫归隐，而是清醒地放弃了仕途，将家族的根基扎进了泥土里。

这一选择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家族上升通道。牟家不再将希望寄托于科举功名，而是深耕农业，广置田产、精研经营之道。至十四世牟墨林(人称“牟二黑子”)时，家业臻于鼎盛。牟墨林的经营手腕极为高明：灾年时他开仓放粮，但不是施舍，而是以粮换地，换得土地后仍由原佃户耕种，只收五成租，远低于当时七八成的普遍标准。佃户们口耳相传“宁跟牟二黑，不跟官府爷”，纷纷投奔，家业滚雪球般壮大。至清末民初，牟氏拥有土地6万亩、山林12万亩，佃户村遍及153个村镇，年收租量达660万斤，富甲胶东、名扬齐鲁。

但财富并未腐蚀这个家族的精神内核。牟家子弟自幼在“悦心亭”私塾读书，但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为了明事理、通算术、善经营。家规明确规定：子弟不得吸食鸦片、不得赌博、不得纳妾、不得欺压佃户，违者逐出家门。庄园内设“宝善堂”药房，常年聘请名医坐诊，不仅为族人看病，佃户亦可免费取药；“阜栖”粮仓储备的粮食，除自用外，常年预留一部分用于赈济灾荒。这种“以农为本、兼济乡里”的理念，让牟氏庄园不只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一个自给自足、运转有序的小型社会。

庄园里至今保留着大量胶东民俗的鲜活印记。我第二次造访时正值端午前夕，恰好赶上庄园举办民俗展。几位当地老人在“师古堂”前的天井里捏花饽饽，枣山的褶皱被捏得一丝不苟，鲤鱼饽饽的眼睛用红豆镶嵌，活灵活现；西厢房里有人在剪窗花，“喜鹊登梅”“连年有余”的图案在剪刀下翻飞而出。最热闹的是婚俗表演。新娘坐的是牟家传了五代的朱漆花轿，轿帘上的苏绣牡丹是当年牟家眷耗时三年绣成的，轿夫的号子声穿过六重院落，仿佛把人拉回了百年前的时光里。栖霞花饽饽、剪纸、抛绣球、迎亲礼等非遗项目，正是依托牟氏庄园这个载体，才得以在现代化浪潮中保留下最原生的样貌。

地位

一座庄园里的中国缩影

牟氏庄园的价值，远非“民间小故宫”的赞誉所能涵盖。1988年，它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界更愿意称其为“百年庄园之活化石”——这个“活”字，才是它真正的分量所在。

所谓“活化石”，不在于建筑保存完好，而在于它完整地封存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从崛起到衰亡



虎皮墙上莲花开。

的完整周期。从明初牟敬祖出任栖霞、落地生根，到十世牟国琬弃官从农、另辟蹊径，再到十四世牟墨林将家业推至巅峰，最终在民国动荡中走向解体——牟氏庄园两百年的营建史，恰是封建地主经济从扩张、成熟到崩塌的微观标本。

牟家的衰落并非骤然倾覆，而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晚清时期，随着厘金制度加重和新式洋货涌入，胶东传统的土布、酿酒等手工业遭受重创，佃户交租能力下降，庄园收入开始缩减。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各路军阀以“军需”为名频繁勒索，牟家不得不一次次变卖家产。抗日战争时期，栖霞成为抗日根据地，牟家主动捐献了大量粮食和药品支持抗战，这份民族大义被佃户铭记至今。1945年土地改革后，牟氏土地全部分给佃户，庄园先后作为政府办公场所、学校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辟为博物馆对外开放。从私有财产到公共文化遗产，牟氏庄园的身份转换，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缩影。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位教授曾感叹：牟氏庄园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生长性”。不同于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一次性规划设计完成，牟氏庄园历经12代人、两百余年不断增建，却始终严守中轴线对称布局，每一代人的新建部分都与整体和谐统一，从未出现“违章搭建”。这种跨越时空的规划自觉，在中国民间建筑中极为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近代史研究专家则指出：牟氏家族的兴衰轨迹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转型几乎完全同步。它的崛起依托于明清小农经济的繁荣，它的鼎盛得益于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积累，它的衰落则对应着近代工商业对传统农业的侵蚀和革命浪潮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摧毁。读懂了牟氏庄园，就读懂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一切。

牟家最后一代居住在庄园里的后人晚年曾回故地探访，站在虎皮墙前良久无言。他说小时候在院里跑着玩，墙缝里的铜钱还在；后来铜钱都不见了，但墙还在，楼还在，那些他祖父讲过的家族故事好像还飘在空气里。如今电视剧《牟氏庄园》的热播让更多人认识了这座古建筑群，但我总觉得，真正的牟氏庄园不在荧屏上，而在那些被无数双脚磨得温润的青石板上，在虎皮墙斑驳的纹路里，在那些至今仍在诉说着“耕读传家”家训的匾额背后。

两次造访，两种心境。第一次我看见的是房子，第二次我看见的是历史。离开的那天傍晚，夕阳斜斜地打在“西忠来”的门楼上，“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八个大字被镀上一层暖金。几个游客还在匆匆拍照打卡，我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吃完剩下的半个苹果，忽然明白为什么第一次没能读懂它——那些砖瓦里藏着的不是风景，是十几代人的生活，是几百年的悲欢，是需要你把脚步放慢到足够轻、足够慢，才能听见的低语。牟氏庄园不言不语，静静立在栖霞城北，等待每一个愿意驻足凝望的人。有些人走了两遍才看懂它的故事，这或许正是文化遗产最深层的意义——它不是用来被消费的，而是用来被反复理解的。



悠悠往事

日前，收拾草棚里的杂物时，我发现了一只久远的贯(音)绳钩。60年前，这只不起眼的物件，曾伴随我度过了一段极不平常的岁月。它见证了一个水荒严重村落的吃水景况和战胜水荒的奋斗历程。现在的年轻人，自幼生活在自来水时代，很少有人能相信和理解老一辈人的这种经历和付出的代价了。

那时，北方农民吃水靠从井里汲取，每个村都有祖宗留下的赖以生存的水井。水井对百姓来说，同土地一样重要。粮食充足，则民心安。上个世纪60年代，我妻子的娘家徐家村严重缺水。全村300多户人家、1500多口人，只有两眼井，村东头一眼，村西头一眼。每一眼井从地面到水位都有几丈深，逢上旱年水位还要下降数米，所以每家都备有几丈长的贯绳，专门用来排队打水，可见吃水是何等紧张了。贯绳的一端，固定着一个特制的铁钩。铁钩有舌条，只要套进简系，等于上了保险，除非连贯绳一起滑进井里，不然水桶是不会单独脱落的。

祖辈并非不想多打井，而是无水源可打。徐家村坐落于栖霞、福山交界处的镇泉山前，这一带地下是大理岩层，石灰岩密座相连。20世纪70年代，两县又相继建起几座水泥厂，空中烟云缭绕，空气也是燥热的，所以梯田、泊地都经不住旱。有一条由山沟小溪形成的河流，自上游缓缓而下，5里以外能自此引水灌溉。而到了徐家村西头的粉子山，河水突然失踪，河床是白花花的砂石，被太阳烤得火热。过了徐家村，向东5里以外的车家村(福山界内)，水流又奇迹般地出现。有经验的老农说，徐家村的水，随着岩层的缝隙渗到地下了。所以，这里很难找到打井的眼。由于这个原因，徐家村便成为全县最缺水的村庄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成为徐家村的女婿，定居在这个村子里。学校离家有22里路，最令我犯难的就是吃水了。旱天井里水少，好不容易打上来半桶水，却像泥汤一样浑浊，需澄清一宿才能食用。有时年轻人要下井用瓢舀水，舀干以后，控上一段时间，渗点水再汲取食用。遇到这种情况，妇女洗衣服要到外村找水，或者到亲戚家去洗。天早了，庄稼没水洗，村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枯死。

1970年初夏，为了解决徐家村等村的水荒问题，时任县水利局局长衣培松派专人到上海购进一台地下水勘探电测仪，并先后派刘祖德等水利技术员到烟台、掖县(今莱州)、福山等地参加省水利厅举办的地下水勘探学习班。刘祖德一行学成归来之后，受命把徐家村当作实验基地。他们在村里村外，到处给大地号脉，但由于经验不足，始终确定不了理想的地点。期间，衣局长又邀请烟台水利局和水文站的专家前来会诊，最后选定在村西约2华里的粉子山以东、公路一侧的部位施工。据测，这里的水位离地面约有十二三米，是最浅的一处，大队决定在此修建一处扬水站。

是年，秋收一结束，挖水塘的战斗就打响了。大队书记徐培强、大队长徐宝川亲自挂帅指挥战斗，全村男女老少120余人齐上阵，刨的刨，挖的挖，推的推，拉的拉，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一个冬天，人流不减，汗流不止，一直干到1971年春节前。大年过后，战斗又开始了，一直挖到小麦将熟。随着水塘越挖越深，大家的情绪日趋紧张。因为一旦挖不出水，麦收开始就要停工，汛期来了，无法施工，将会前功尽弃，损失可就大了。水利技术员和大队干部都急得团团转，当即派人到烟台水文站请专家来现场勘探。专家从黄县(今龙口市)水利工地风尘仆仆地赶来，连口水都没喝，直奔工地。他跳进水塘观察了一阵，又从湿乎乎的部位捧起沙石辨认了许久，高兴地说：“地下水很快就出来了，你们放心干吧！”这时，在场的人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又挖了两天，石土层下去2米多，在专家指定的几个方位，湿漉漉的沙石蠕动了。小伙子们高兴地挥舞着镐头，狠狠地刨了下去。随着揭开的酥石礞，几股泉流汩汩涌现，接着几条水龙似的泉流，从溶洞中窜出，整个工地欢呼起来，沸腾起来。

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一个长50米、宽20米、深12米、蓄水12000立方米的水塘和扬程32米的扬水站建成了，灌溉面积达300多亩。第二年，水浇田亩产粮食达到800多斤，比水浇前提高了一倍。

然而，只有这一个水塘，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和农业的需求。离村不足200米的大庄头水泥厂和村办的大理石厂、面粉厂、石子厂等都急需用水。寻找新水源仍是当务之急。

1973年，栖霞县成立了钻井队，钻井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徐家村。他们先后两次安营扎寨、寻找水源，但均因水位太深、岩层复杂而宣告失败。

1974年，新任大队书记徐志远上任后，重整旗鼓，继续找水。他与支部、大队干部几经磋商，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请来省水文站的专家来村会诊，最后决定在村外西泊架机钻井。这个位置靠近河床，属沙质土层，施工难度很大。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松散的沙石，随钻随滑，立不住井壁。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当即召开“诸葛亮”会，集思广益，用树条编织一批长筒式筐笼下入管道，抑制沙石的滑落，又用干黏土边钻边填，终于使井壁立住。当钻到80米处时，钻头打进了溶洞，源源不尽的地下水库终于找到了。为了充分利用这股地下水，他们又在同一方位连续钻了5个井口，以备连环使用。同时，他们又安装了3台抽水泵抽水，大大满足了全村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水需求。

为了根治水荒，在西泊打井的同时，他们在距村东2华里的镇泉山不远处，挖水塘建第二座扬水站。1975年秋收后，全大队抽调100多名劳力在山上安营扎寨，党支部书记徐志远、大队长徐绍绍和社员们一起，一日三餐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昼夜不停，三班轮流作战，整整苦干了一冬。离春节还有6天时，一个长60米、宽30米、深12米的水塘建成了。泉眼比大沙碗口还粗，60马力的两台柴油机同时抽，一天一夜也抽不干。春节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修建水利附属设施，扬水土上。与此同时，西泊机井也修出几条渠道，有的爬上山山坡，有的与东扬水站相衔接。这样一来，不管遇到怎样的干旱，各个方向都有充足的水源，徐家村从此告别了水荒。

过了一段时间，大队又投资为各家各户安装上了自来水。从此，每个家庭，不管在厨房还是在卫生间，水龙头一扭，清水便哗哗流出，煞是方便。也就是从这时起，全村用于井上打水的水桶、贯绳和担杖等，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可能是由于井上打水的那段经历印象太深，抑或是被水利工作者和徐家村人战水荒的精神所深深震撼，我把使用了十几年的贯绳钩收藏起来了，随我到了几个新的住处。如今回想起来，仅带进县城就有40年了。如今见之，我十分惊讶，也很亲切。物件老了，但记忆犹新，由近及远，初心难忘。

贯绳钩的记忆

□张荣起